

美國干預香港事務的歷史脈絡

同樣是TVB，同樣是褚簡寧主持的「清心直說」，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唐偉康先生一年前與一年後取態迥異，簡直是自打嘴巴。去年1月8日，當主持人詢問他對香港政改方案的看法，他如是回答：「基於對香港的尊重，就政府立法，我不會有明確的表態。坦白說，這會是外交干預（foreign interference）。」換做直白的說法就是，「我不能評論香港立法，否則就是外交干預」。今年2月26日在同一個節目中，他竟然毫不避忌地實施「外交干預」，公開評論香港修訂《逃犯條例》，還威脅說「或影響美國與香港的雙邊協議」。

陳少波 正思香港顧問公司總裁

不過短短一年，唐偉康先生為何突然強硬？為何在這個時間點，跳出來公開干預香港立法事務？港美關係是否面對新的變化與調整？這些問題的答案，恐怕還要從港美關係歷史脈絡的變化與調整中找尋。

英抱怨美國擴大在港編制

這段時間，美領館一直在高調慶祝在港建館175周年，唐偉康也專門別上「美國愛香港」的襟針。畫外音無非是想刷一刷美國在港的存在感，凸顯其從港英政府時代開始就在香港投射影響力。其實，美國真正重視香港、精心佈局香港，至少要溯源到冷戰開戰前後，東亞局勢劇變之際。

美國人當年關閉了所有在中國內地的大使館和領事館，把相關業務遷至香港，令香港變為收集情報、從事反共宣傳和秘密行動的重要樞紐。於是，美領館開始聚集與美國駐港僑民不成比例的領事、新聞官、軍事人員和秘密行動專家。當年英方官方文件顯示，1951年9月美領館內的美國人員達到96人，包括5名領事和至少24名副領事。英國政府殖民地部曾抱怨說，「在一個美國僑民只有稍多於1,000人的地方，顯然不需要96名官員來照顧」，他們更意有所指地說，「這些（美國）官員如果真的物有所值，他們一定是在做其它工作，即與中國有關的工作」。英美作為盟國，在香港事務包括情

報收集方面當然有不少合作，但是英方有自己的戰略考量，也有安全方面的顧慮，因此他們不僅抱怨美國擴大在港編制，還不時施以小動作，對美國在港的秘密行動和公開反共宣傳加以約束，例如在冷戰之初，港英政府曾突然出手，在香港廣播電台停播《美國之音》的節目，也曾充公過美國新聞處的傳單。

美1992年正式大規模介入香港事務

由於英方掌握主導權，始終抱有一定的戒心，美方在香港的行動受到各種掣肘，也不得不尊重英方的決定，而這一切的徹底改變要等到1992年。這一年，全球正邁入後冷戰時代，美國成為世界唯一強權，日裔美籍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正式發表《歷史的終結》一文。而英方正部署從香港的「光榮撤退」，這一年的7月9日，時任英國保守黨黨魁彭定康出任最後一任港督，並在同年10月發表首份施政報告提出政改方案，展開香港後過渡期的中英政治交鋒。在這個大背景下，美國國會當年5月正式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 of 1992），以國內法的名義，開啟美國正式大規模介入香港事務的肇端。

冷戰年代，美國國會曾出台的相關政策文件（包括1957年的NSC5717文件和1960年的NSC6007/1文件）涉及美國的對港政策，但是皆着眼於香港的地緣政治地位，並不重視香港自身的地位與價值。《香港政策法》則更弦改轍，強調「香港在當今的區域和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與美國的強大經濟、文化和其他關係密

切相關，令美國高度關注香港的持續發展與繁榮穩定」。

意圖把香港打造成華人民主政治櫥窗

基於這一戰略判斷，《香港政策法》明確指出，美國繼續視香港為獨立經貿區，例如規定香港享有進口配額和原產地證書（參見SEC.103.1）；《香港政策法》也明確表示，支持民主化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也適用於美國對港政策（參見SEC.2.5）。概括來說，在新的戰略定位下，《香港政策法》致力推動香港完成「雙化」，即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從而推動美國對香港的兩大「輸出」——推動貨物、資金的自由流動，以輸出美國貨物和服務；推動所謂的「價值觀的自由流動」，以輸出美式民主。具體來說，美國的戰略目標很清楚，就是要把香港打造為兩個「櫥窗」：自由經濟體的櫥窗和華人地區民主政治的櫥窗。

美國《香港政策法》實際上確立了後冷戰時期美國的對港戰略。由這部法案，我們能夠清晰地探尋美國影響香港政經事務乃至文化交流的脈絡。它也實質上實現了英美勢力在香港的權力交接。1993年之後，美國通過實施《香港政策法》，在英方的配合下，着手對香港展開一系列的政經佈局。

美國是如何佈子在香港下了一盤大棋呢？我們下篇續談。（系列之一）

中美貿易實施機制公平才穩定

紀頌鳴 資深評論員

正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一年一度兩會中，中美貿易談判毫無疑問成為代表、委員關注的焦點。在兩會特別安排的商務部記者會上，多次參與兩國經貿磋商的中美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在兩會記者會上透露，中美經貿磋商的前景是有希望的。目前，雙方經貿團隊正在繼續全力進行溝通、磋商文本，按照兩國元首確定的原則和方向，達成一個協議，取消所有相互加徵的關稅，使中美雙邊貿易能夠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需要關注的是，什麼才是正常的軌道？王受文強調了，任何中美貿易實施機制必須是雙向的、公平的、平等的。中美達成一個互利雙贏的協議，符合美國的利益，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期待。反過來說，任何不平等的，非雙方共同遵守的實施機制，並不是正常軌道。

事實上，放棄平等、公平的中美貿易關係，而建構在相互加徵關稅上，對任何方面都沒有好處。從美國最近公佈的統計數字看，美國對全球出口增長了

7%以上，但是對中國出口卻下降了7%。今年前兩個月的統計數字也顯示，中國與美國的進出口貿易下降了19.9%。相互加徵關稅最終是互相有損。

王受文說：「可以說，相互加徵關稅對工人不利、農民不利、出口企業不利、製造企業不利，它損害了投資者的信心，減緩了企業做出投資決策；相互加徵關稅，損害了美國的利益、中國的利益，也損害了世界的利益。」

在中美貿易談判過程中，美方咄咄逼人，提出多項美方要求中國進行結構性改革的領域，提出多項美方要求中國實施的措施，以改變中美貿易的原有結構。應該明白，實現兩國貿易關係的「公平、互惠和平衡」應該是雙方的，也應該是公平的，平等的，這才是維護雙方友好關係的長久良方。平等的關係、公平相待，是減少矛盾和摩擦的基礎，可以建立互相尊重的關係，有這樣的基石關係才能維持長久。

公平是一個社會學名詞，在法律上，公平是法所

追求的基本價值之一。公是公共，指大家，平是指平等，意指為大家平等存在。由於人之差異而沒有絕對的公平，只有相對的公平。公平就是處理事情要合作合理，不偏袒某一方或某一個人，即參與社會合作的每個人承擔着他應承擔的責任，得到他應得的利益。如果一個人承擔着少於應承擔的責任，或取得了多於應得的利益，這就會讓人感到不公平。

從特朗普政府上台後的貿易行動，是以「美國優先」為出發點、以單邊貿易執法和重鑄貿易協定為主要內容逐漸成型的貿易政策框架。問題是，抱守冷戰零和思維和重啟單邊主義工具既不能解決問題，也令其產生負面影響，並影響世界貿易秩序。

中美經貿磋商，前景是被看好的，原因在於中國有解決兩國貿易落差的誠意，更因為中美兩國元首已經達成了重要共識，確定了原則和方向，兩國貿易代表團的努力，雙方攜手，建立公平、對等的執行機制，而不是單方面的承諾和保證，才是確保中美兩國貿易關係長久穩定的基礎。

修改《逃犯條例》愈快愈好

鄧清河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執行主席



保安局提出修訂《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及《逃犯條例》，容許與其他沒有刑事司法互助協議的地區，透過一次性個案形式移交逃犯。我希望立法會能夠盡快通過修例，以堵塞法例漏洞。

我非常支持港府提出的《逃犯條例》的修例建議，事實上有關修例程序應該愈快愈好。從今次香港少女在台灣被殺並棄屍草草一案，整個事件可說是慘絕人寰、人神共憤，不論是法理還是情理上，都應還受害人及死者家屬一個公道，通過今次修例，讓嫌犯

移交到台灣接受法律公正的審判。

《逃犯條例》第503章已在香港實行超過20年，今次正是這宗台灣殺人案而顯露出法律缺憾，令社會看到有人正在利用現時法例上的漏洞而逃避其應有的法律審判。倘若港府對現存法例上的漏洞繼續視若無睹並且袖手旁觀，只會令受害人的家屬永遠得不到公義，也令社會公義和法治精神無法得到彰顯。

反對派憂慮修例後，日後或令在港的政治犯，有機會被移交回內地受審。在我看來，這些所謂憂慮純粹只是反對派的危言聳聽，他們只是試圖將有關修例

建議妖魔化、政治化和陰謀化，除此之外，他們對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屬並無任何憐憫同情之心。

香港是國際社會公認的法治城市，我們擁有健全的法律體制，港府通過今次修例進一步完善和修補法例上的漏洞，正是顯示港府對該條例謹慎處理的態度。修例建議提出由行政長官發出證明書後，再向法院申請臨時拘捕令，讓法院進行聆訊及作裁決等程序，按照這一系列程序，香港人應對本港司法制度抱持信心，相信香港法庭一定會考慮不同因素後，才審批移交個案。

中國航天穩紮穩打「漫步火星」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探月工程總設計師吳偉仁在兩會表示，中國今年準備發射「嫦娥五號」，實現在月球採樣返回，中國將成為繼美國和俄羅斯之後第三個月球採樣返回的國家，將實現中國開展航天活動以來「四個首次」：首次在月球表面自動採樣，首次從月面起飛，首次在38萬公里外的月球軌道上進行無人交會對接，首次帶着月壤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

中國將實現在月球任一點降落

2019年年底，中國探月工程第一階段將會圓滿收官，順利實現「繞、落、返」的探月三部曲。下一階段，中國將會實現在月球的任一點降落，並發射「嫦娥六號」、「嫦娥七號」和「嫦娥八號」等月球探測器。

吳偉仁特別指出，中國將在2020年發射第一個火星探測器，在火星着陸並巡視探測。「螢火一號」主要科學探測目標是對火星的空間磁場、電離層和粒子

分佈變化規律，以及火星大氣離子逃逸率進行探測。此外，還將探測火星地形地貌、沙塵暴以及火星赤道附近的重力場。這是中國第一次嘗試探測火星，說明中國早就對探測火星做了技術可行的工程設計和製造。

中國航天在月球探測中的穩紮穩打，為探測火星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技術積累。火星探測過程與月球類似，都是要經歷「繞、落、返」三個階段，中國在地球以外的月球即將完成這三部曲的實際工程應用，完全可以把「嫦娥」工程技術應用的成果和經驗推廣到火星探測中，也就是中國航天的深空探測計劃完全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腳印。在完成了完整的月球探測工程後，中國不失時機同步啟動火星探測工程，在原有「繞月球」的技術基礎上，做到「繞火星」，本身就是一條技術捷徑。

但火星相比地球距離要遠得多，因此，火星測控難度要比38萬公里的月球測控難度大很多，尤其是長時間的時延會讓火星探測器對自主控制要求更高，

才能確保火星探測器該變軌時自主變軌，該減速時自主減速，該降落時自主降落等。

2030年中國載人登月預備登陸火星

尤其是探測器降落在火星的難度要大得多，因為火星大氣十分稀薄會導致探測器下降速度異常快，只能用更大的降落傘來減速，但降落傘直徑過大容易撕裂，因此必須採用組合降落方式，如開傘減速和制動火箭減速等。

儘管「嫦娥五號」探測器年底就實現「四個首次」，但畢竟是降落在近在咫尺的月球，做好火星探測的「四個首次」，需要有更多創新技術。此外，「玉兔二號」月球車多次成功實現自主休眠、喚醒、自檢、工作等，也為研製火星探測器巡視車提供了比較好的技術實踐基礎。

人類登月工程的目標之一，就是要借助月球這個「跳板」實現登陸火星。中國「嫦娥」後續工程也為中國登陸火星提供「中國跳板」。

投入大灣區建設 鞏固香港獨特優勢



張學平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日前，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香港代表團發表講話時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局作出的重大戰略謀劃，是國家發展「大棋局」上的「大戰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最大特色是「一國兩制」，賦予香港「中心城市」和「主角」定位，為香港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提供了重大歷史機遇。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由規劃轉向落實，香港可憑藉自身特殊優勢，以國際創科中心建設為突破，打開參與大灣區建設的新局面。推進大灣區建設一舉多得，不僅有利於豐富香港「一國兩制」實踐，也可破解三地發展面臨的瓶頸問題。特區政府積極配合，落實規劃，本港各界也應充分調動，整裝待發，下好香港發展的關鍵一步棋。

正如王志民主任所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最大特色是「一國兩制」，這賦予了香港「中心城市」和「主角」定位。粵港澳大灣區源於「一國兩制」，也必將豐富「一國兩制」，這也是為什麼大灣區規劃綱要把「『一國兩制』，依法辦事」作為大灣區建設六項基本原則之首的原因。

「一國兩制」作為大灣區建設的最大特色和優勢，規劃綱要確定了堅持「一國兩制」是大灣區建設的根本原則，這有利灣區內強強聯合，突出各自優勢；規劃綱要更將香港列入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首位，凸顯了香港的獨特地位，為香港發展提供新平台和空間。

去年大灣區的經濟總量達1.6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排名第11位的韓國。通過大灣區建設，有助解決各地發展面臨的深層次矛盾，發揮協同效應。

香港連續25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市場成熟發達，香港應努力建設國際創科中心，打開參與大灣區建設的新起點。同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都市，與世界市場高度接軌，可大力向國外推介宣傳大灣區建設，吸引國際資金和人才投資大灣區，推動大灣區互利共贏發展，這也是香港發揮潛力的重要一環。

一言蔽之，推進大灣區建設，有利於豐富「一國兩制」實踐，有利於香港在新時代改革開放發揮獨特作用，在國家發展中大展身手。香港各界應在堅持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的基礎上，大膽實踐，抓住機遇，再創高峰。

理大遏制「港獨」歪風應予肯定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全國兩會近日先後傳達遏制「港獨」和中央對「港獨」零容忍的立場，協助年輕人提高國家民族認同感及愛國心，培育他們成為愛國愛港的後繼人。可惜，「激青」們因「民主」之名，將「港獨」歪風引進校園，並對師長愈趨不敬，動輒發生欺凌師長事件。理大最近終於狠下決心撥亂反正，以退學、停學和社會服務令形式懲處犯事學生。

汪洋主席的政協工作報告與韓正副總理的「落組」發言，都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堅決反對「港獨」這兩個涉及香港的議題為主。韓正呼籲港區人大代表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反對「港獨」，並要團結年輕人，幫助他們增強國家民族認同感及愛國心，並且培育成為愛國愛港的後繼人。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官方網頁撰文指出，雖然政府工作報告並未提及「港獨」，但報告強調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依照國家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當然包含了禁止在港澳從事任何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政治底線和法治原則要求」。

理大「民主牆」事件只是最新的一宗個案。若未能將不正歪風於初始萌芽期，便嚴肅跟進制止，情況會急遽陡變，暴力事件和暴力程度都會大增，恐將後患無窮。

教育不只教知識，還要教做人，以尊師重道和海納百川為主的道德品行教育必不可少；但過去幾年，在「民主」的幟下，對「港獨」、「本土」和「自決」的訴求充斥校園，大學生競相以勇武抗爭作為「進步」的體現，並且公然以「民主」之名，遂行忤逆道、肆意衝擊校方管理層的行徑，而理據愈見浮濫，行動亦愈見粗鄙，滿口粗言穢語、言語霸凌、非法禁錮、肢體衝撞，暴力失禮不一而足，更有形成新常態之虞。

至於理大校方嚴懲犯事學生的做法是否合適，固然可以討論，但關鍵在於學生堅持無視校方決定，執意向上校長辦公大樓層層要求對質，真正目的是什麼？其實，懲罰也是一種教育，可讓涉事者及早認清形勢和社會觀感，亦可避免無知者跟風冒進，校園不致變戰場，學生不致走上政治不歸路。理大此役有效遏制有關歪風，應予肯定。